

日语政治语篇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

姚艳玲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语言学研究基地/东北亚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本文基于政治语言学的理论,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及识解操作,以日语的政治语篇为语料分析对象,探讨日语政治语篇的制造者所操纵的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具体分析三任日本首相表明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认识的语篇运用哪种认知识解模式来实现话语策略,解析其话语意图和意识形态。研究表明三任日本首相均运用概念隐喻操作来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安倍谈话”使用提喻、名物化、被动化等识解操作,通过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来回避由于直接表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逃避对战争的责任。

关键词:政治语篇;话语策略;识解操作;概念隐喻;提喻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1-0028-07

0 引言

语言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国内外学者已有评介与著述(田海龙,2002;雷大川,2009;杨可,2012;蒋春丽等,2013;卢婷婷,2011,2016,2018)。这些研究从政治语言研究的视角探讨政治的语言问题,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交际目的,并进一步提出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如何建立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并构建政治语言学的学科。近年来政治语言学作为政治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语言学及政治学学界的瞩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语言在政治交际中的建构作用。本文在政治语言学的理论视角下考察日语的政治语言,基于批评认知语言学手法来分析日语的政治语篇,以此来探究在日语的政治话语中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来建构政治交际。

1 政治语言学研究

孙吉胜(2013)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角度提出国际政治语言学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与语言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可以围绕语言在学理和政策层面继续深入。他基于语言具有的政治性、权力性、建构性的特点指出国际政治研究关注语言的重要性。孙玉华等(2015)从政治语言学学科建构的角度,厘清了政治语言学学科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认为政治语言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和政治学交叉点上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它是就语言(言语)而为语言与政治相互关系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运用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语言与政治的共变关系问题,通过政治交际研究作为言语活动的政治话语,研究通过语言运用获得政治权利与意识形态操控的规律与策略。

以上两项研究都主张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来探讨语言与政治的共变关系,比如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揭示政治语言的建构效果及话语策略。孙玉华等(2015)对政治语

收稿日期:2019-09-10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服务‘东北亚外交外事高端人才’培养项目的日语专业研究生课程内容改革路径研究”(YJSJG2017-10)、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东亚区域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2018CXTD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艳玲,女,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语言学研究基地/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语语言学研究。

言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而清晰的梳理和界定,提出了政治语言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将遵循孙玉华等(2015)的理论框架,运用批评认知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日语的政治文本,从语义层面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及意识形态操控的策略。

2 前人研究与本文立场

2.1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旨在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语篇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如何为之服务(辛斌等,2013:1)。CDA的研究不断深入,日益凸显交叉学科的研究性质。其研究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政治话语、媒体话语等。国内代表性研究有田海龙(2002,2013a,2013b,2016);辛斌(2012);辛斌等(2013)等。CDA分析以语言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交往活动,通过语篇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利关系。刘文宇等(2016:45)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热点研究对象是政治话语,通过分析文本语篇及多模态语篇来揭示那些不易被人们觉察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权利阶层如何运用语言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和现存社会结构。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CDA成为政治话语研究较为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2.2 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取向

辛斌(2012:1)认为话语分析不仅需要社会视角,也需要认知视角,指出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田海龙(2013a:2)指出从话语层面切入的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借助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发现话语/文本在概念隐喻、语法隐喻、指向/背景、转喻、范畴化等方面的特征,通过分析这些文本/话语特征解释文本的社会意义。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

张辉等(2008)较早提出了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指出二者之间在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同的侧重,因此互补性较强。认为二者的结合既能进一步提高CDA研究的明晰性和深度,又能促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考察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张辉等,2008:13)。另外张天伟等(2016:18)认为通过解读不同话语策略的识解操作,研究话语背后隐性的意识形态,可以揭示语篇和概念化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融合为探究政治语篇所操纵的话语策略和其背后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2.3 批评认知语言学

政治语言的研究方法从较为常用的批评话语分析,到出现认知视角的取向,逐步呈现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张辉等(2019)明确提出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详细介绍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目标、理论和应用以及方法论。张辉等(2019:1)认为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可以称为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关注言语使用(usages)和其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由于人的语言理解和产出是由语言符号与认知识解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分析政治或公共话语可以揭示写作者/说话人如何通过操纵语言(使用不同词语、构式以及不同的识解)达到操纵读者/听话人思维的目的(张辉等,2019:2)。文章概述了批评隐喻分析、话语空间理论及趋近化理论的研究现状,论述了批评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及心理实验方法相结合的最新进展。

2.4 本文立场

以上本文确立了政治语言研究的理论视角,并在概述政治语言研究方法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晰了批评认知语言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将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及识解操作

理论,以日语的政治语篇为语料分析对象,来探讨日语政治语篇的制造者所操纵的话语策略和其背后的认知机制,尝试从政治语言学视角以批评认知语言学为分析方法来揭示日语政治语篇背后隐性的意识形态,以期推动日语的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发展。本文以日本首相的公共演讲语篇为语料分析对象,运用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方法讨论话语策略与认知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话语策略的识解操作进行解读。同时揭示日语政治语篇制造者话语策略的共性特征与不同语篇制造者的话语策略的个性特征。

3 日语政治语篇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

3.1 政治语篇文本的选取

本文分析的政治文本选取了村山富市、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三任日本首相关于历史问题认识的语篇为语料。包括以下两部分:在二战结束后 50 年、60 年、70 年的时间节点表明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认识的“村山谈话”(1995.8.15)、“小泉谈话”(2005.8.15)、“安倍谈话”(2015.8.14);及三任首相在任期内发表的有关历史认识的其他公共演讲语篇。共计 10 篇,约 17221 字。时间跨度为 1995 年至 2016 年。通过分析三任日本首相运用何种认知知识解模式来实现话语策略,解析其话语意图和意识形态,探讨政治语篇和语篇制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三任日本首相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三篇“谈话”语篇长度如下表所示。

表 1 三任首相“谈话”语篇长度

语料名称	村山谈话	小泉谈话	安倍谈话
字数长度	1353 字	1135 字	3354 字

由上表可以看出,“村山谈话”与“小泉谈话”篇幅大体相当,而“安倍谈话”篇幅较长。

表 2 三任首相关于历史认识的其他公共语篇长度

语料名称	村山富市	小泉纯一郎	安倍晋三
字数长度	4756 字(共 3 篇)	5185 字(共 3 篇)	1429 字(1 篇)

从表 2 可以看到,安倍除在战后 70 年表明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以外很少在公共演讲中提及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

3.2 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

3.2.1 批评隐喻分析

批评隐喻分析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最为紧密也是最成功的研究(张辉等,2019:2)。它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突出了“隐喻研究的政治化”趋势。隐喻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政治话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隐喻(metaphor)基于相似性(similarity),以较具体、熟悉的经验域的理解来构建较抽象、不熟悉的经验域。也就是以源域来理解目标域。表 1 三篇“谈话”语篇中三任首相均运用了隐喻的概念化表征方式,借助“旅程”概念来描写日本发动战争的行为和战后重建的进程。其具体表达形式如下表所示。

表 3 三任首相“旅程”隐喻操作的表达形式

语料名称	表达形式
村山谈话	日本は幾多の困難を乗り越えて、来し方を訪ねて、人類社会の平和と繁栄への道を誤らない、戦争への道を歩んで…
小泉谈话	戦争への道を歩んではならない、国際社会への復帰の第一歩を踏み出した、戦後六十年の歩みを踏まえ…

语料名称	表达形式
安倍谈话	先の大戦への道のり、戦後の歩み、進むべき針路を誤り、戦争への道を進んで行きました、平和国家としての歩み、アジアの人々が歩んできた苦難の歴史

将“旅程”中反映身体经验的“走路”“迈步”的相关成分映射到“战争”的目标域中,用“走上战争之路”来指称“发动了战争”,用“步子、步伐、道路、迈出第一步”来指称二战后发展的进程。由以上例示可以看到语篇制造者用较为具体可视并具有体验性的事物(“道路”)来描写对听众来说不太熟悉的“战争”行为,通过提供较为熟悉的“走路”经验框架,来唤起听众的认知和情感共鸣,从而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来直接地影响受众的情感倾向。

3.2.2 提喻(synecdoche)

提喻(synecdoche)是基于包含关系(类和种的关系)而发生的转义。可以使用具有一般语义的形式来表达比较特殊的语义;或者使用具有较为特殊语义的形式来表达较为一般的语义(初山洋介,2009:28)。例如日语“花見に行った。”(去赏花)一句中,以“花”指称“桜”(樱花),是使用“上位概念”来表达“下位概念”。而“喫茶店でお茶でも飲もう。”(去咖啡馆喝杯茶吧。)一句中,以“お茶”指称“飲み物”(饮料),是使用“下位概念”来表达“上位概念”。

提喻基于人们可以将范畴进行伸缩的认知能力。以“上位概念”指称“下位概念”,可以产生委婉的表达效果。例如日语中使用“用を足す/用足し”(办完事)来表达人的大小便等排泄行为。这就是以语义较为宽泛的“用を足す/用足し”(办事)来表达语义相对狭小的排泄行为,对“用を足す/用足し”(办事)本来语义进行二次激活,从而产生委婉表达的效果。

“安倍谈话”中出现了“深く名誉と尊厳を傷つけられた女性たち”(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多くの女性たちの尊厳や名誉が深く傷つけられた”(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遭受严重伤害)的语句。这种话语策略即是用上位概念的“女性”指称下位概念的“慰安妇”,通过模糊概念范畴的大小来回避由于直接表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体现了其表达意识形态的需要,达到其蒙蔽受众的目的。“安倍谈话”中还有一例对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行使武力解决外交、经济的困境表述为了“力の行使”,而没有表达为“武力の行使”。“力”是一个上位概念,通过使用较为宽泛的“力”来指称“武力”,同样也是回避直接表述,抹消了“武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2.3 指示词

不同的人称指示名词标示了话者在话语交际中的定位,指示性短语可将听者和说者置于相同的情景坐标中,即相同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范畴中,而将其他行为者定位于与之不同的社会范畴,从而确立外群体与内群体的距离和差异关系(唐韧,2014:21)。日语的人称指示名词一般称为“人称词”。人称词的用法反映了说者自身以及听者的认识方式,体现了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方式。三任首相的“谈话”语篇中指示词的使用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4 三任首相“谈话”语篇中指示词的使用分布

	私たち	我が国	私	我々	政府	日本
村山谈话	3	4	5	1	1	1
小泉谈话	1	7	1	—	—	—
安倍谈话	13	8	—	—	—	8

三篇“谈话”中都较多使用了“我が国”(我国)这一指示词。通过确立“我国”的定位,表明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坐标中“日本”对战争历史认识的立场。“村山谈话”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指示词种类较为丰富,除第一人称的“我、我们、我国”外,还使用了“政府、日本”等表明政府、国家立场的名词。而其中第一

人称的“私(我)”较为突出,凸显了村山个人对于历史认识的见解或立场。“小泉谈话”中频繁使用的是“我が国”,表明在国与国的定位关系中的“日本”作为国家的立场。而“安倍谈话”中可以看到“私たち”(第一人称指示代词复数形式)的使用频率较高。他通过使用“我们”的指示词将话者与听众置于同一情景坐标中,从而有意缩短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操纵听众的情感取向。

3.2.4 名物化(nominalization)

认知语法认为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与总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是对事件的常态观察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沿时间轴对事件加以有序扫描,后者是对事件施加整体性识解的扫描。动词侧显过程(process),顺序扫描即被范畴化为动词,而名词侧显整体,总体扫描即被范畴化为名词成分(兰艾克,2008,2016:193-195;大堀寿夫,2002:19)。这种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识解方式在语言编码上表现为动词与名词的转换。名物化(nominalization)即“名词化”是指可以直接用动词或动词结构表达出的语义,换成用名词或名词短语来表达,这种语言词性的选择,在政治或新闻语篇中成为语篇制造者有意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辛斌(2005:80)指出大量使用名词性成分替代动词性结构能有效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通过掩饰沿时间轴发生的“动作—结果”的施受关系,从而达到对事实因果关系的模糊效果。

在“安倍谈话”中就发动战争的行为安倍使用了“先の大戦における行いについて…”(关于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的表达形式。“行い”(okona-i)是动词“行う”(okona-u)的名词形态。本应该采用“先の大戦において行ったことについて…”(关于在那场战争中曾做过的事情)的动词形态,却通过使用“名物化”策略模糊了事实的因果关系。动词侧重描写动作行为,刻画过程性。通过使用名词形态,削弱了动作感。“行い”(okona-i)一词掩饰了实际动作中的施事关系和因果关系,逃避了动作行为主体、即日本作为发动战争国家的责任,来满足隐含表达其意识形态的需要。

“名物化”是“安倍谈话”频繁使用的一个话语策略。例如在语篇的开头部分谈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退出国际联盟这一历史事实时表述为了“満州事变、そして国際連盟からの脱退”。前者以名词形式、后者以“脱退する”的名词形式“脱退”结束句子。通过“名物化”前者删除了动词谓语“起こす”(发动),后者删除了动词“脱退する”的动词词尾及时态。上述两例“名物化”都是将事件沿时间轴发生的过程性抹消,将引发事件的动作主体及蒙受事件结果的受害对象付之不问,把历史事实模糊化从而避开了言及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3.2.5 被动化(passivization)

“被动化”也是“安倍谈话”频繁使用的话语策略。例如“将来ある若者たちの命が、数知れず失われました”(拥有未来的年轻人的生命不计其数地失去了)、“中国に置き去りにされた三千人近い日本人の子どもたち”(被遗弃在中国的近三千人的日本人的孩子们)、“多くの女性たちの尊厳や名誉が深く傷つけられた過去”(许多女性们的尊严和名誉被严重伤害了的过去)等。辛斌(2005:80)还指出“语篇中的被动结构具有与名物化相似的功能,它为掩饰因果关系和行为者提供了方便”。

认知语法认为被动态的功能可以归纳为:①状态化;②动作主体的非焦点化;③被动者(受事)的话题化等三方面(大堀寿夫,2002:163)。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换体现了认知焦点的转换,受事升格为主语即意味着引发事件的动作主体“脱焦点化”,削弱了行为或过程的动作感。上述例子中分别使用了“失う”(失去)、“置き去りにする”(遗弃)、“傷つける”(伤害)的被动态形式,而引发这一结果的当事者,即“谁让人们失去了生命”“谁遗弃了孩子们”“谁严重伤害了女性们的尊严与名誉”等动作的发出者都没有凸显出来,通过回避提及施事、对其背景化,隐瞒了造成这一结果的责任者。

3.2.6 三任首相政治语篇的批评性比较分析

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行为安倍使用了“名物化”(行い),而村山在“迎来战后50年的村山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中明确使用了“行った”的动词形态(例:“我が国が過去の一時期に行った行為は、…アジ

アの近隣諸国等の人々に、いまなお癒しがたい傷跡を残しています”(1994. 8. 31)(我国在过去一个时期所做的行为……给亚洲各邻国的人们留下了时至今日也难以治愈的伤痕。)同样对于安倍频繁使用被动化,回避提及“责任者”的事件,村山在演讲中也都明确使用主动态(“傷つける”),明确表达了事件的动作主体(例:“いわゆる従軍慰安婦問題は、女性の名誉と尊厳を深く傷つけた問題であり、…”)(1994. 8. 31)(所谓“慰安妇”问题是严重伤害女性的名誉和尊严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安倍的谈话对这些历史问题是别有意识地选择了名物化、被动化及前文述及的提喻等话语策略,企图模糊日本的历史认识,逃避其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一谈话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和真诚的道歉。安倍的这种政治意图尤其体现在下面表明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表述上。

村山谈话:我が国は、…多くの国々、とりわけアジア諸国の人々に対して多大の損害と苦痛を与えました。…ここにあらためて痛切な反省の意を表し、心から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いたします。

小泉谈话:我が国は、…多くの国々、とりわけアジア諸国の人々に対して多大の損害と苦痛を与えました。…改めて痛切な反省と心から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するとともに、…。

安倍谈话:何の罪もない人々に、計り知れない損害と苦痛を、我が国が与えた事実。…我が国は、…繰り返し、痛切な反省と心から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表明してきました。

“小泉谈话”沿袭“村山谈话”,二者均采用同样的词汇和表达式,明确使用了“与えました(给~带来了)”、“表明する(いたします)(表示)”的动词形态。而“安倍谈话”中却表述为“与えた事実”(给~带来了~的事实)、“表明してきました”(到现在为止曾表示了)。在“与えた”后面附加“事実”后完全抹消了这一行为的动态过程,只是将它表达为一个单纯存在的抽象化事件。而“~てきます”表示时间轴上由过去向现在发展的趋近性状态变化,并且使用了“た”过去式。这种表达只是陈述了历届内阁的政治立场,并没有直接表明安倍内阁的立场,从而回避了自身对历史认识的责任。

4 结语

本文分析表明概念隐喻是日语政治语篇较多使用的识解操作,通过较为熟悉的源域来构建对听众不熟悉的目标域。三任日本首相均使用概念隐喻操作,来描述发动战争的过程和战后重建的历程,用较为具体可视并具有体验性的事物来操纵话语受众的概念化认知,来直接地影响受众的情感倾向。“安倍谈话”则使用提喻、名物化、被动化等识解操作,通过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模糊对战争的历史认识,来回避由于直接表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逃避对战争的责任,体现了其表达意识形态的需要。另外本文还从指示词的视角分析了三任首相话语策略中的表述立场。本文通过对政治语篇话语策略的识解操作进行解读,揭示了语篇背后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

今后本研究将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手法来分析政治语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考察政治语篇中的关键词的词频与词语搭配。并基于认知语言学识解的主观性、情态及言据性等概念化表征方式解构话语幕后的意识形态的操纵。

参考文献:

- 初山洋介. 2009. 日本語表現で学ぶ 入門からの認知言語学[M]. 東京: 研究社.
大堀壽夫. 2002. 認知言語学[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蒋春丽, 杨可. 2013. 政治话语研究——俄语语言研究的新方向[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 10-13.
刘文字, 李珂. 2016. 国外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趋势的可视化分析[J]. 外语研究(2): 39-45.
雷大川. 2009. 政治: 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建构[J]. 文史哲(2): 162-168.
卢婷婷. 2011. 政治语言学的学科构建——《政治语言学》述介[J]. 当代外语研究(1): 60-61.

- 卢婷婷. 2016. 俄罗斯政治语言学的主要论题及其特点[J]. 外语学刊(5):41-46.
- 卢婷婷. 2018. 政治语言学:理论与方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罗纳德·W. 兰艾克. 2016. 认知语法导论[M]. 黄蓓,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孙吉胜. 2013. 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J]. 外交评论(1):12-29.
- 孙玉华, 彭文钊, 刘宏. 2015. 语言的政治 vs. 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1):1-7.
- 唐韧. 2014. 批评话语分析之认知语言学途径:以英国媒体移民话语为例[J]. 外语研究(6):18-22.
- 田海龙. 2002. 政治语言研究:评述与思考[J]. 外语教学, 23(1):23-29.
- 田海龙. 2013a. 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两种路径及其特征[J]. 外语研究(2):1-7.
- 田海龙. 2013b.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4):6-10.
- 田海龙. 2016.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J]. 外语与外语教学(2):1-9.
- 辛斌. 2005.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辛斌. 2012.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认知话语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4):1-5.
- 辛斌, 高小丽. 2013. 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 外语与外语教学(4):1-5.
- 杨可. 2012. 俄罗斯现代政治语言学——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J]. 中国俄语教学 31(1):7-10.
- 张辉, 江龙. 2008.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J]. 外语学刊(5):12-19.
- 张辉, 杨艳琴. 2019. 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J]. 外语教学, 40(3):1-11.
- 张天伟, 郭彬彬. 2016.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策略和识解操作研究[J]. 外语教学, 37(6):17-22.
- 语料出处: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本」(代表:田中明彦、日本政治・国際関係 データベース、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 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of Japa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YAO Yanl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Linguistic, this paper employs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al oper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 demonstrates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manipulated by the authors and the hidden cognitive mechanism in the Japanese political discourses. The corpus consists of political discourses which are viewed a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historical cognition of the war. Specif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what kind of cognitive construal models thre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have used to realize their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explores their discourse intentions and ideologies as wel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hree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they all apply conceptual metaphor operations to manipulate the conceptual cognition of their discourse audience. Additionally, construal operations, like “nominalization” “passivization” and “synecdoche”, are also utilized in “Abe Speech”, in order to avoid a negative impact of direct expressions and hence eva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war.

Key words: polit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strategy; construal opera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synecdoche

责任编辑:肖谊